

《孙子兵法》华人英译描述性研究

朱晓轩^{1,2}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暨南大学 深圳旅游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3)

摘要: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描述翻译学研究强调把被忽略或排斥的事物纳入研究范围,去除中心系统的内在优越性和文化垄断性,使边缘系统显身,进而使其逐步被接收并参与到文化大多元系统的构建中。在《孙子兵法》英译研究中,华人译本尤其是早期的华人译者和译本一直被边缘化和忽视。采用历时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分历史时期对《孙子兵法》的中西译本特征进行分析,特别梳理被遮蔽和边缘化的华人英译《孙子兵法》发展脉络,不仅对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有利补充,同时也将开启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崭新视角。

关键词:多元系统论 《孙子兵法》英译; 华人译者; 描述性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1(2016)03-0168-05

DOI: 10.13501/j.cnki.42-1328/c.2016.03.036

一、引言

20世纪七十年代,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派代表人物伊塔马尔·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十余年后,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发展其理论,并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下,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勒菲弗尔(Lefevere)等对该理论进一步阐发,吸收文化研究模式,拓展“规范”概念或是直接弃用多元系统术语,另外提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者“三要素”论等理论话语,将对文学系统的运作模式以及翻译文学地位的阐述扩大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社会要素对文化多元系统内翻译的选择与功能的影响研究。这一理论不仅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而且打破了传统的以“忠实”“对等”为目标的应用翻译研究成规。

多元系统论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虽然在西方学术界反响强烈,但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它才真正被引介到国内学术界,其显著标志是由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暨研究所主办的《中外文学》杂志在2001年第3期推出“多元系统研究专辑”^[1]。在此之前,中国由古至今应用理论为重的学术传统使得翻译研究领域一直是规定性的“标准—分析—结论”模式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十年来国内译学界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有了很多有益尝试和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应用于有一定时

间跨度的翻译史论研究上成果丰硕,但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学术话语如果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其研究结果也必然只能继续为“他者”服务,而忽略自身的真正诉求。

以《孙子兵法》英译为例,五十余个译本中华人译本超过二十个,而有幸被研究或者系统介绍过的尚不到三分之一,研究严重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出现明显的“西方译本”偏向。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客观且较为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孙子兵法》英译历程,重拾那些被西方建制和中心意识形态排斥或遗忘的华人译本,不仅对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有利补充,同时也将开启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崭新视角。

二、英译版本考察与翻译研究问题浅析

对于《孙子兵法》英译本数量考证,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这在典籍外译研究中是不多见的。清华大学王铭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到20世纪末,总共有13种不同的英译本”^[2]。杨玉英博士考察“英语世界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多达三十二种,21世纪出版的译本达十六种,为总译本数的一半”^[4]。屠国元、吴莎认为《孙子兵法》英译的百年间出现了33种译本^[5]。而谢道挺称“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卡尔斯罗普上尉的第一个日文转译本以降,到2009年止,译本已超过40部”^[6]。章国军博士则认为“截止到2007年为止总共出现了36个《孙子兵法》

收稿日期:2016-05-10

基金项目:“珠海市优势学科——翻译学”项目相关成果。

作者简介:朱晓轩(1982-),湖南汉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译本”^①。笔者研究发现,出现这些译本统计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英译本的界定各不相同。有些研究者将同一译者不同时期出版的译本算作不同译本,并特意考察同一译者不同译本之间的演进和变化,如杨玉英考察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 Sawyer) 1993, 1994, 1996, 2005年四个版本的区别。有学者将研究《孙子兵法》及其实际应用的著述也算作一种特殊译本形式,如苏桂亮将21世纪难以计数的应用类译著分为企业管理类、领导艺术类、市场营销类和金融投资类等^②。此外,除了全译本之外,《孙子兵法》也有很多节译本和插图本。如1988年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英译《孙子兵法》在美国波士顿香巴拉出版社出版后,1991年又出版了其袖珍本,1998年出版了插图英译本。

二是研究者们陷入西方主流意识支配下的范式陷阱“知彼不知己”,不够全面。现有《孙子兵法》英译研究的考察对象往往仅限于在西方出版传播,即“英语世界”的英译研究。即使极少数学者对华人译者、译本有所涉及,也是从西方研究者视角,描述记录存在于西方译者或者学者眼中的华人译本情况。西方的一些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途径把“标准”译本和译入语中的正统意识形态视为学术研究的唯一合法对象,用以维护主流建制的利益,华人译本一直处于被有意忽视,甚至贬低和排斥的边缘境地。而国内研究者又不加批判地全盘继承和引入西方观点,使得被遮蔽和边缘化的华人英译本得不到显身的机会,也就必然走向“不知己”反而“知彼”的尴尬境地。

现有的《孙子兵法》英译版本和描述性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一批学者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有待完善、订正之处,不仅如上所述版本考察出现“西方偏向”,在具体描述华人译本问题上,本就很少涉及仍错漏频发,令人忧心。例如苏桂亮先生和吴莎博士的论文中,均将唐子长英译《孙子重编》出版地写为台湾,且认为该译本是“贾译本的编辑、修改,多采用汉英对照方式,主要面向华人世界”。实际上,唐子长与翟里斯翻译所据底本不同,文化身份的巨大差异也必然导致其翻译目的不同,翻译策略也各有特色。在未有专门考察的前提下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以偏概全,想当然而为之的嫌疑。甚至有文章将我国著名翻译家林

戊荪先生名字写作“林茂荪”,贯穿全文并发表于众。这些问题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全面梳爬《孙子兵法》英译本尤其是重拾华人译者与译本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国内典籍英译研究中华人译者和译本所处的边缘地位也可由此管窥一斑。

三、《孙子兵法》华人英译历时性描述

据不完全统计,不将同一译本再版(重译本分开计算)、应用类和研究型著作纳入英译本计算范畴,《孙子兵法》在一百一十年间,国内外出现英语全译本52种^③,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以色列、斯里兰卡、中国等国家出版发行,其中华人译本24种,占总数的46%。

综观中西译者《孙子兵法》英译与传播历程,笔者从军事历史学的战争史角度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特别突出被忽略和遮蔽的华人译本,根据不同时期战争史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生存状态,尝试考证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翻译意图,探讨华人译本在英语文化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形成的原因。最后,在历时性描述基础上对华人英译和传播《孙子兵法》的轨迹进行勾勒,反思。

(一) 世界大战影响时期(1905~1945)

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四十余年间,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产生了广泛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将各国人民置于深重的战火苦难之中。而中国也未能幸免地沦入了被瓜分的境地,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史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被迫沦陷和奋起反抗的血泪史。

该期间产生的《孙子兵法》中外英译本共6种,其中华人译本1种。英国驻日炮兵上尉E.F.卡尔斯罗普(E.F. Calthrop)1905年以日文版“十三篇”为底本,英译了第一部《孙子兵法》(Sonshi)。1908年,他以中文版《孙子兵法》为底本,重新翻译并加入《吴子兵法》,命名为《兵书:远东兵学经典》(The Book of War: The Military Classic of the Far East)。1910年,英国汉学家莱昂内尔·翟里斯(Lionel Giles)翻译的《孙子兵法——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理论》(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 The Oldest Military Treatise in the World)由伦敦卢扎克(Luzac)公司出版发行。该译本以孙星衍校刊《孙子十家注》为底本,采取英汉对照的方式,沿袭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经典的做法,将原文、译文

^① 该统计尚不包括无法考证的一些译本,如吴莎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的2007年美国出版的小贺拉斯·寇克洛夫(Horace E. Cocroft, Jr.)译本,以及2016年最新出版的译本,如2016年2月20日美国创意空间独立出版平台(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出版发行的朱迪思·杜兰(Judith Duran)译本等。

和注释放在同一页面,方便读者阅读。其鲜明的文献学特点影响了诸多后世译者,也是目前再版、重印数量最多的英译本^[150]。此外,该时期西方译本还有马切爾·考克斯(E. Machell-Cox)本、A. L. 萨德勒(A. L. Sadler)本两种。

1945年,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个华人英译本——郑麀(Cheng Lin)英译的《兵法——约公元前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The Art of War: Military Manual Written cir. 510 B.C.)。此书为其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之一,英译蓝本是孙星衍辑平津馆本《孙子十家注》^{[9]序八},由中国辞典馆人文组企划印行处最先在重庆出版发行。该译本由国学大师杨家骆先生作序,其中明确提出郑麀英译群经诸子目的是为了“正欧洲人所译汉籍之刺谬,而为中西文化交通之媒介。”而于《孙子兵法》英译则是为了“病英汉学家齐尔士译本之未尽当”^{[9]序八}。

本时期的《孙子兵法》华人英译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时被殖民和宰割的被动境地导致中国文化处于世界文化的最边缘位置,这也使得《孙子兵法》第一个英译本不是由中文底本直接翻译而来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孙子兵法》的被发掘和英译并不是由于其在在中国的应用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而是因为日本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军事强国,在日俄战争中对《孙子兵法》的灵活运用取得巨大成效,震惊了当时的西方军界,于是就有了卡尔斯罗普第一个《孙子兵法》日文转译本。这也从侧面客观解释了《孙子兵法》华人译本出现得比较晚的原因,深陷战争囹圄的国人还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根本无暇顾及西传中国文化。其次,不同的译者文化身份直接导致不同的翻译目的,这个时期军事目的与文化研究目的译本各占一半。汉学家翟里斯译本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并不断再版的过程,也是孙子的军事价值和文化价值被逐渐认识和吸收的过程。至郑麀译本出版的1945年,翟译本已经经历35年的消化与融合,初步建立起一套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西方眼中的“他者”孙子文化体系。而郑麀作为第一位华人译者,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意图修订翟里斯译本中的错漏之处,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为华人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当时俨然公然挑战西方文化及其主流建制权威地位,注定逃脱不了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

(二) 冷战时期(1946~1991年)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美苏及其盟友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继续对抗和竞争,但“相互遏制,不诉诸武力”。这期间的中国,“是处于

两大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唯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10]中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中苏联盟,中苏对立,中美巴以准盟友姿态对抗苏联,直至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转冷的复杂演变。中华民族在夹缝中求生存,经历了自身痛苦蜕变,逐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该时期出现中外译本共14种。1963年,美国海军退役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翻译的《孙子——战争的艺术》(Sun Tzu: The Art of War)出版发行,一经问世就获得巨大成功。英国知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 Basil Henry)为之作序,盛赞译者是“深谙战争与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学者”。该译本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作翻译丛书,连续100多周荣登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榜。近半个世纪以来该译本多次重印,并转译成法、德文,成为流行于美国和欧洲的主要译本之一,也成了《孙子兵法》英译研究者绝不可忽视的译本。该时期出版的西方译本还有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编辑作序的译本、R. L. 温(R. L. Wing)译本和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译本。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时期海内外华人译者逐步关注《孙子兵法》,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大幅提高,出现华人译本10种。1960年,美国华盛顿中国艺术协会出版了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唐子长编译的《孙子兵法重编》,因特殊原因,“仅印数百册,远不能满足订单需求”。1969年,经过修订和改名后的《冲突的原理:孙子重编》(Principles of Conflict)于美国由圣拉斐尔加州师范学院出版社(T.C. Press)出版发行。唐子长从军事学角度对底本进行结构性调整是译者作为军事战略学家和孙子研究者的一项有益尝试,而将重编版本英译介绍给西方世界既是对当时西方学者提出“孙子兵法结构松散无序”问题的回应,也是对先驱“中心”译者的抵抗和形式创新,是该版本最大特色。第一位将《孙子兵法》英译本介绍到美国的编者,美国准将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ips)为该译本作序,并盛赞在对《孙子兵法》结构重编及其英译上,唐子长译本“极大超越了当时所有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翻译”^{[12]8}。

1987年,中国外交学院袁士槟副教授将陶汉章将军撰写的《孙子兵法概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斯特林出版公司(Sterling Publishing)出版,命名为《孙子兵法——现代中国人的阐释》(Sun Tzu's Art of War: The modern Chinese Interpretation)。《孙子兵

法概论》是陶汉章将军结合刘伯承元帅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对《孙子兵法》的阐述,并融入自己长期学习研究《孙子兵法》的体会撰写而成的。该译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美国采用,并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学院选作当时的军事教材。

1989年,T. W. 郭的译本《孙子:战争手册》(Sun Tzu: Manual for War)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阿特利出版社(ATLI Press)出版发行。该译本将孙子兵法从战争制胜之道提升为人际冲突制胜之道,用最平实的语言解释最深奥的道理。1989年,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金融、工商管理教授陈万华和南开大学管理学系教授陈炳富合著《孙子兵法及其在管理中的一般运用》,其中翻译了《孙子兵法》全文,并首次提出孙子管理思想六大原则,该本出版后被纳入加拿大、美国和中国有关高校的教材参考书。此外,该时期台湾学者致力于孙子兵法研究与英译,共有葛振先译本、罗顺德译本等5种译本付梓。1991年,新加坡《海峡时报》双语记者兼高级撰稿员梁荣锦将蔡志忠编绘国学经典读本《兵家的先知: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在新加坡出版发行,受到读者欢迎。

冷战时期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中国可以借助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力量大力发展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不断对抗和周旋中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大多元系统中也从被排斥的边缘境地走向被重新认识和逐步接受,再次开始了向世界文化中心的融入。该时期《孙子兵法》英译中,华人译者和译本趁势而起,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特征,试图用蕴含于《孙子兵法》中的东方传统军事战略思想、哲学思辨积极参与世界文化构建。例如唐子长译本看似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实则是警告世人侵略战争必定失败,劝诫美国决策者们“运用完美策略,才能领导世界并获得全胜”^{[12][184]}。袁士槟翻译的陶汉章将军《孙子兵法概论》将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和用兵策略与古代兵法相结合,尝试在介绍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基础上,与西方形成军事理念、政治策略等方面的对话,受到了西方文化多元系统的接纳。华人译本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尝试得到了较正面地回应,从第一时期西方对郑廉译本的故意贬低和排斥,到本时期对唐子长译本的逐步认可,对袁士槟译本军事理论特征的部分接受,华人译者在中华文化外译中不断努力打破西方“中心”译本的垄断与遮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 后冷战时期(1992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元化格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时期内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孙子热”迅速升温继而在西方扩展,出现了世界性《孙子兵法》研究热潮,英译版本数量迅猛增长。近25年间出现译本多达32种,海内外华人译本13种。

该时期《孙子兵法》英译呈现多元化融合气象,华人译本在其中积极参与和构建全球大文化多元系统,简要将该时期的华人《孙子兵法》英译事业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国内外译者吸收中国《孙子兵法》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后,竹简本的整理和发掘使得翻译底本进一步完善,国内诸多学者如吴如嵩、李零的最新研究成果被融合利用。1993年1月,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 Ames)在美国出版了《孙子兵法:第一个融合银雀山竹简的英译本》(Sun-Tzu The Art of Warfare: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Incorporat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Yin-Ch'ueh-Shan Texts)。同年5月,潘嘉玢、刘瑞祥翻译的《汉英对照<孙子兵法>》在北京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译本也吸收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孙子》整理与研究最新成果,由《孙子》研究专家吴如嵩校定原文和白话译本。虽然该版本比安乐哲译本晚四个月出版,但该译本在1991年就汇编于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校释》六种语言版本中。该本“在研究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历代传本的优点”^[13],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第一个融入银雀山汉简本的英译本应该是由中国军人学者潘家玢、刘瑞祥合译的,而安乐哲译本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参考汉简的译本。

第二,20世纪最后十年内,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层面文化外译的政策支持催生了一大批国内学者译本,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期待为中西方读者提供更贴近中国文化内涵的译本,大多以中英文对照方式出现,也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中英文学习资料。199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黄葵编著,蒲元明英译《白话英译孙子兵法》。1994年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翻译家林戊荪《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合译本在北京出版发行,1999年被收入“大中华文库”,2003年由美国长河出版社在美出版发行,经数十次再版印刷,受到中西读者好评。2016

年1月外文社又重新设计封面再版了该译本。1995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谢国良评注,张惠民翻译的《孙子兵法与评论》,该译本收录于“熊猫丛书”中,该套丛书还包括《汉魏六朝诗选》、《Confucius》、《POETRY/PROSE OF MING & QING》《Deliverance》《中国当代寓言选(英汉对照)》等。1996年,中国对外翻译公司与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了罗志野英译的《孙子兵法一百则》,作为一百丛书系列之一,将十三篇分成一百段,分段落翻译的同时强调其内在联系。2007年该译本被收录于“中译经典文库”予以再版。这些译本多在重译的基础上,针对西方“中心”译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甚至将对西方译本的评述作为新译本的后记,从翻译底本、原文理解、翻译策略等方面阐述其存在的问题和重译的紧迫性。

第三,海外华人译者对于《孙子兵法》的翻译和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1993年,J.H.黄以银雀山竹简本为底本的英译本在美国纽约出版发行,他用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对《孙子兵法》进行介绍和评论,资料非常翔实。该本2008年在纽约再版。1998年,隋赞(Sui Yun)在新加坡出版了其英译本。2003

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战略管理及行为学专家黄昭虎(Wee Chou Hou)翻译的《孙子兵法:亚洲视角的诠释》(The Art of war: An Illustrated Translation with Asian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在新加坡出版,销量在美国最大的网上购书平台亚马逊迅速飘红,十分可观。该译本首次采用汉语拼音(而非通用拼音)将每一句原文加注标音,并使用简体中文原文,方便读者学习中文以更好地理解孙子的战争哲学。近20年来,马来西亚华人邱庆河用马来文、英文、中文分别翻译出版了《孙子兵法》译本,著有多部相关著作包括台湾版《孙子管理兵法》等共26本,平均不到一年就出版一本,是目前世界上翻译和注述《孙子兵法》相关作品数量及版本最多的华人^[4]。

上述对不同历史时期《孙子兵法》华人译本的历时性描述已基本展现了华人译者在《孙子兵法》英译事业中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孙子兵法》英译历程长达110年,共涵盖52个译本,华人译本数量近半,我们还可以将其中华人译本发展脉络概括如下(见表1)。

表1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发展脉络

	世界大战影响时期 (1904-1945)	冷战时期 (1946-1991)	后冷战时期 (1992至今)
译本总数	6本	14本	32本
华人译本数	1本	10本	13本
华人译本比例	16.7%	71.4%	40.6%
华人译者 翻译目的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架设中西交流桥梁	翻译目的趋向多元化,军事文化、战争策略以及现代中国军事思想的介绍,孙子处世哲学、管理思想的介绍与传播	翻译目的多元化特征明显,对话西方译本,促进世界文化的重新定位。为中西方读者提供优秀学习资料,传播中华文化内涵。
华人译者 对原文 版本选择	清孙星衍、吴人骥同校《孙子十家注》	底本丰富:宋吉天保辑《孙子十家注》、宋施子美注《武经七书讲义》、当代陶汉章将军著《孙子兵法概论》、蔡志忠编绘国学经典读本《兵家的先知:孙子兵法》等	底本几乎包括所有主流传本,结合银雀山出土汉简本以及中国当代《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李零、吴九龙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含:曹操著《魏武帝注孙子》、宋本《十一家注》、银雀山汉墓出土《简本》、李零著《孙子译注》等。
华人译者 文化身份	海外留学归国学者	军人背景的旅美作家、外交翻译家、台湾学者、新加坡双语记者等	译者身份多元化:国内《孙子兵法》研究会成员、军人学者、新加坡战略管理学专家、外语教学与研究专家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华人英译和传播《孙子兵法》的轨迹:1945年胸怀“搭建桥梁”之志的郑麀在重庆首开华人英译《孙子兵法》先河,随后世界各地华人译本层出,与各个时期的西方译者通过文本进行对话,积极传播具有中华民族内涵与特质的“自我”中国文化,而非西方译者眼中的“他者”中国文化,从而成了《孙子兵法》英译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在这百余年中,华人译本经历了第一时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多元文化系

统对其的故意贬低和排斥,到第二个时期的逐步认可和部分接受,直至最后一个时期的多元融合的曲折历程。华人译者参与中国文化外译的主观意识越来越强烈,无论是出于个人研究兴趣或者建制内赞助人、出版机构等影响作用,不断努力打破西方“中心”译本的垄断与遮蔽,这都表明中华民族正积极参与世界文化构建并促进其重新定位。因此,对《孙子兵法》英译进行全面描述性研究,特别梳理被边缘和遮蔽的华人译本,不仅为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应用提供了有利补充,同时(下转第185页)

- 版),2005(5):5-8.
- [2] Krashen, 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 [3] Stephen D Krashe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M]. USA: The MIT Press, 1994.
- [4] Gardner, R.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Social and Applied Contexts* [C].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 [5] Jane Ansoel, Michael Swan. *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 Stephen D Krashe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M]. USA: The MIT Press, 1994.
- [7] 许玉兰. 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学习焦虑研究 [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14(9): 67-70.
- [8] Horwitz, E. K. & Cop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 125-132.
- [9] 谈慧娟. 农村地区学生英语学习焦虑成因及其解决对策 [J]. 宜春学院学报, 2010(1): 12-15.
- [10] 束定芳. 外语课堂教学当议 [J]. 外语界, 2006(4): 25-28.

责任编辑: 谭大友

~~~~~

(上接第172页)也将开启中国文化外译研究的崭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J]. 外国语, 2003(4): 59-66.
- [2] 马祖毅, 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3] 王铭. 二十世纪《孙子兵法》英译研究 [D]. 清华大学, 2007: 6.
- [4] 杨玉英. 英语世界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5.
- [5] 屠国元, 吴莎. 《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历时性描写研究 [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187-191.
- [6] 谢道挺. 《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主体性勘测——以翟林奈、闵福德二译本为中心 [J].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119-122.
- [7] 章国军. 误读理论视角下的《孙子兵法》复译研究 [D]. 中南大学, 2013: 41.
- [8] 苏桂亮. 《孙子兵法》英文译著版本考察 [J]. 滨州学院学报, 2011(5): 149-156.
- [9] 郑廉. 《孙子兵法》中英对照/白话语译 [M]. 台北: 世界书局, 2006: 序九.
- [10] 陈兼. 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6): 16-25.
- [11] Thomas Cleary. *The Art of War* [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88: viii.
- [12] Tang Zi-chang. *Principles of Conflict: Recompilation and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 on Sun Zi's Art of War* [M]. San Rafael: T.C. Press, 1969: 184.
- [13] 潘嘉芬, 刘瑞祥. 汉英对照《孙子兵法》[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104.
- [14] 韩胜宝. 《孙子兵法全球行》系列报道 [EB/OL].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1/09-24/3350748.shtml> (2011-09-24).

责任编辑: 王飞霞